

# 誰製造了俄國革命？

王健文

## 一 引言

眾所周知，大革命改變了世界。現代社會及現代性的起源與確立都脫胎於經典革命。自法國大革命以來，前工業時代傳統思想觀念裏基於人、社會與自然和諧共存而形成的寧靜秩序因德性墮落而回到原點的運動，即由「亂」重新回歸到「治」的過程被賦予全新的涵義，革命不再以回歸舊秩序的公正、正義為訴求；革命必然地着意於政治體制的激烈變革，也必然地與暴力具有親緣關係，革命暴力的特點就在於其意識形態的近乎神聖性的證明。這樣的證明通常立足於將象徵符號的變革、合法性的基礎、某一政體的基本制度架構與政治和社會秩序的新願景結合的嘗試<sup>①</sup>。

與法國大革命不同，俄國革命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口號和理論體系進行的，它既具有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嘗試，又具有世界主義的面相。對於當代中國而言，政權與政治體制的合法性乃是基於「走俄國人的路」而形成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俄國革命主張以極其殘暴的手段推動社會變革，試圖建設一種絕對平等的社會秩序。在共產主義運動已經全面失敗的今天，我們並不難理解它為甚麼必然失敗，但是，這個必然要失敗的烏托邦運動，當年為甚麼能搞那麼大？為甚麼馬克思主義能吸引那麼多優秀的人物獻身？如果我們抱着這樣的問題意識去追尋拷問歷史的話，更應該去梳理和分析俄國人走過的路是甚麼樣的路，這條路為甚麼走不通，新的道路在哪裏，等等。正是基於對這一意義的關注，我們應該去追問，為甚麼俄國人選擇了共產主義革命？尤其更應該去追問，是誰製造了革命？如何走出革命？後革命時代應怎麼辦？這一系列問題使得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革命話語、革命話題與革命道路。

讓我們從金雁女士的新作《倒轉「紅輪」：俄國知識份子的心路回溯》<sup>②</sup>（以下簡稱《倒轉「紅輪」》）說起。此書從知識份子心路歷程的角度切入，以俄國知識份子何以選擇革命及對俄國革命道路的反思進而尋找俄國真正的出路為題，長距離立體地進行分析，為我們探究知識份子與革命的關係以及社會革命與政治建設之間複雜而微妙的關係提供了極好的文本。尤其是，如果我們考慮到當

俄國革命主張以極其殘暴的手段推動社會變革，試圖建設一種絕對平等的社會秩序。在共產主義運動已經全面失敗的今天，我們並不難理解它為甚麼必然失敗，但是，這個必然要失敗的烏托邦運動，當年為甚麼能搞那麼大？為甚麼馬克思主義能吸引那麼多優秀的人物獻身？

今中國社會對於革命話語的態度，本書更具有時代的焦慮感與鮮明的現實問題意識——與其說是在討論為甚麼俄國選擇革命，不如說是在討論中國如何避免革命。我們看到俄國知識群體內部的分層與代際之間的強烈對立時，每每令人心有戚戚又心有餘悸。革命如斯之重乃至不可輕談，然而歷史發展之內在邏輯昭示於世人的是堅不可摧的法則，社會進步有賴於共識之臻達，知識份子擁抱革命乃是出於對現實強權冥頑顛頂的反彈。「最深刻的知識份子的語言往往決定一個時代」<sup>③</sup>，救贖之路或許端在人心之維的良善、良知、寬容之回歸。因此，這本對於俄國「紅輪」討論的著作，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關注。換言之，我們應認真對待俄國革命，認真對待俄國知識份子，更需重新思考知識份子與革命的關係。

## 二 「紅輪」從何馳來？

《倒轉「紅輪」》以俄國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仁尼琴 (Aleksandr I. Solzhenitsyn) 開篇，由近而遠地倒敘。眾所周知，索翁耗力最大、最為震撼人心並奠定了其文化—思想界地位的是兩部多卷本巨著，即流亡前寫的三卷本《古拉格群島》(The Gulag Archipelago, 1918-1956) 和流亡期間花幾十年時間寫作而直到臨終都未出齊的十卷(三十冊)《紅輪》(The Red Wheel)。《紅輪》被索翁稱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的一部作品」，「尋找俄國歷史災難中某種最高的宇宙意義」願望的作品，寫出了蘇聯國內「迄今為止，沒有允許任何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寫作的歷史」，是關於俄國戰爭與革命時代的「全景歷史」<sup>④</sup>。

索爾仁尼琴之所以將著作命名為《紅輪》，本身就有「倒轉紅輪」的含義在內，也即「倒轉俄羅斯所走的道路」。他認為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都是「西化」影響下毀滅俄羅斯傳統的一丘之貉，前者幾乎與後者同樣激進，並且直接導致了後者。

按金雁的解釋，索爾仁尼琴之所以將該著命名為《紅輪》，本身就有「倒轉紅輪」的含義在內，也即「倒轉俄羅斯所走的道路」，此話出自於俄羅斯哲學家羅扎諾夫 (Vasily V. Rozanov) 和「路標派」<sup>⑤</sup>，他們都認為「紅色車輪」這條路，「最終使俄羅斯走進了政治社會的死胡同，俄羅斯走進了不應該進去的胡同」，俄羅斯「沒有找到自己的家」。索翁不僅對十月革命深惡痛絕，而且對導致了十月革命的1917年二月革命同樣反感。他認為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都是「西化」影響下毀滅俄羅斯傳統的一丘之貉，前者幾乎與後者同樣激進，並且直接導致了後者。索翁認為之所以出現1917年的俄國，原因在於「西化」，無論是歷史上的「斯拉夫派」還是「西歐派」<sup>⑥</sup>。那麼，這個「紅輪」應該倒轉到哪裏？索翁認為要倒轉回俄國過去的傳統。這個傳統不是1917年以前沙俄時代的傳統——因為1917年以前俄國人已經「西化」得很厲害了——而是東正教，但又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東正教，那是特指「古老的、具有700年歷史的謝爾蓋·拉多涅斯基、尼古拉·索拉斯基的正教，還沒有被尼康歪曲的、沒有被彼得大帝搞成枯燥無味的俄國正教」<sup>⑦</sup>。

如果沿着這一思路分析，則導致十月革命爆發的原因便是「西化」，革命之後的俄國進行的是共產主義實驗，這一實驗最終以失敗告終。以往中國人對於誤讀、誤導、誤入的俄羅斯道路，更加集中於探究蘇聯解體、蘇共下台的原

因，而從更宏大更深遠的角度講，俄羅斯的失敗在二十世紀其實是一場整個人類共同的實驗的失敗。這固然是由於俄國與西方現代文明總危機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有直接的牽涉，但革命的淵源、性質、形式與過程卻深深地植根於俄國歷史土壤之中。唯有置於如此宏大背景之下，才可能理解俄國革命，甚至才可能理解之後的中國革命。

如果將「紅輪」理解為紅色革命的道路，那麼，倒轉此「紅輪」便是承認「紅輪」的錯誤，即共產主義革命的錯誤，在此基礎上才能將歷史車輪倒轉，馳向正確的軌道。按照《倒轉「紅輪」》一書的分析梳理，從索翁開始引出俄國歷史上的分裂派傳統，介於之間的是十六世紀俄國發生的宗教改革所帶來的知識份子的民間資源。這個知識份子群體中始終存在很大的張力和博弈，貫穿其中的是貴族知識份子和平民知識份子關於俄國道路的爭論。「大分裂」尤其是知識份子之間的分裂是俄羅斯歷史上持久討論的主題：十七世紀是政府與人民分離，十八世紀是貴族與農民分離，十九世紀早期是貴族知識份子與非知識份子的貴族分離，十九世紀後半期是平民知識份子的「兒子」與沉湎和思考的精英「父親」的分離。《倒轉「紅輪」》借「紅輪」之意象來探究「紅輪」是如何駛向俄國。為甚麼俄國的知識份子選擇了革命？是否可以有非革命的道路或者非共產主義革命的道路可供選擇？為甚麼激進主義的知識份子最終勝出卻將革命烏托邦變成了空前的人間慘劇？可以更進一步追問，知識份子在俄國共產主義革命中應負多大責任？俄國知識份子在身處「紅輪」的車轍之中時，是如何使之改變方向的？

從更宏大更深遠的角度講，俄羅斯的失敗在二十世紀其實是一場整個人類共同的實驗的失敗。這固然是由於俄國與西方現代文明總危機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有直接的牽涉，但革命的淵源、性質、形式與過程卻深深地植根於俄國歷史土壤之中。

### 三 貴族知識份子與平民知識份子

《倒轉「紅輪」》從思想史的角度梳理俄國知識份子與革命的關係，尤其是俄國宗教改革之後的分裂派知識份子—貴族知識份子—平民知識份子—民粹主義—共產主義之間的代際更迭，將倒轉「紅輪」的道路選擇重新定格在「向後看的反專制運動」<sup>⑧</sup>，即早期的基輔羅斯時代（九至十三世紀）之反集權化、多元化與自由化。論及俄國道路的特殊性無法不提及東正教信仰。然而，為何俄國知識份子天然地具有反暴君反專制的內在基因，仍是東正教傳統所無法回答的。可能是金雁沒有意識到或者沒有充分認識到的一個因素是，蒙古金帳汗國的中央集權的軍事專制主義對於俄國國家性格的強烈影響。1240年蒙古鐵騎征服俄羅斯，近三百年「韃靼枷鎖」（意指蒙古軍事集權主義的統治，造成了俄國與西方的隔絕，並形成了黠武特徵的民族性格）高度中央集權的兵營式統治，為俄羅斯打下深深的東方專制烙印。因此，俄國國家性格中的中央集權性與暴力性便迥異於一般基督教國家。俄國疆域的廣袤與人口的稀少決定了其對國家主義重要性的強調，而這又與俄國東方亞細亞主義的專制融為一體，國家強大和個人自由產生矛盾，國家要強大的話，必須壓制個人。俄羅斯東正教的彌賽亞主義與一切拯救精神一樣，內含着烏托邦盲信的力量。這本身便蘊含着一種分裂因素，即

承認暴政還是反抗暴政、擁抱西方還是反對西方、否定俄羅斯還是肯定斯拉夫之間的搖擺。但這就是俄國「紅輪」產生的原因嗎？

俄國著名思想家、路標派代表人物別爾嘉耶夫 (Nikolai A. Berdyaev) 在其《俄國共產主義起源及其涵義》中說：「只懂得馬克思主義是解決不了俄國共產主義根源的」，「要了解俄國共產主義的起源，弄清俄國革命的性質，就要搞清楚在俄國被稱作『知識份子』的特殊人物……」◎俄國知識份子從來不是一個整體，內部分化極其嚴重，這或許就是「俄國特色」。但在俄國傳統中他們具有天然的反暴力統治與追求自由傾向。俄國知識人的始祖是拉吉舍夫 (Aleksandr N. Radishev)，當他在《從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寫下「我的靈魂由於人類的苦難而受傷」時，俄羅斯的知識份子便誕生了◎。他們是天生的良心體現者和道德至上者，並且把人民看成上帝的直接化身。在別氏看來，拉吉舍夫是第一批民粹主義者之一，亦可看作是俄羅斯知識份子中主張激進主義的革命路線的始祖。這些俄國知識份子永遠與現實保持距離，思考與現實不相關的大問題，而在東正教以虔誠和憐憫為基調的精神中，他們不是懷疑主義者，而是天生的虔信派、教條主義者，並且把一切問題都上升到宗教層面和終極價值上。那麼，俄國知識份子為甚麼最終選擇了革命？換言之，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共產革命在俄國具有怎樣的特殊意義，以至於俄國最終走向了「紅輪」？答案只能在俄羅斯內部去尋找，在俄國知識份子當中去尋找⑩。

馬克思主義對俄國來說，具有雙重意義：對西歐派來說，馬克思主義是產生於比俄羅斯文化更高級的工業文明的產物；對於斯拉夫派來說，馬克思主義也滿足了他們的要求，因其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激烈地批判和否定。

俄國與西方之間的關係，一直是困擾俄國自身定位的決定性因素。自彼得大帝 (Peter the Great) 之後，斯拉夫派與西歐派的對立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俄國尋求自身國家定位的困惑。亞歷山大一世 (Alexander I) 率反法同盟對巴黎的征服，反而刺激了「十二月黨人」的覺醒和起義，俄國知識份子，無論貴族還是平民，都痛苦而憤怒地面對着一個現實，即沙皇專制、農奴制和皇權之下的東正教俄羅斯帝國從來沒有真正體現過基督教真理。在俄國傳統中，知識份子的力量不在於智慧，而在於心靈，在於良知。知識份子過去和現在的責任是：認識，領悟，反抗，保持自己精神上的獨立，永遠不說假話；在權力尤其是暴力強權面前，他們永遠是「不合時宜者」。基於對俄國落後現狀的不滿，尤其是專制的沙皇制度、落後的農奴制所導致的社會僵化，知識份子處在最敏銳的觀察者角度，深悉其弊端所在◎。因此，馬克思主義對俄國來說，具有雙重意義：對西歐派來說，馬克思主義是產生於比俄羅斯文化更高級的工業文明的產物；對於斯拉夫派來說，馬克思主義也滿足了他們的要求，因其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激烈地批判和否定。如果在俄羅斯帝國本身、沙皇專制制度本身是否體現了基督教的彌賽亞與拯救意識這個問題上做出了否定性回答的話，革命便是順利成章的選擇了。

從邏輯上講，要解決為甚麼會發生革命的問題，只需要解釋為甚麼1860年代平民知識份子的激進主張成為俄國不得不選擇的道路，就會在一定程度上獲得答案。這一答案中固然包含了貴族知識份子無法也無力改變俄國的現實，也包含了平民知識份子基於出身而形成的天然道義優勢與基於行動而具有的組織優勢，但更重要的因素則是專制政治的僵化所造成社會的窒息，為革命烏托邦的激進提供了天然的土壤。這也是回答「紅輪」命題的關鍵所在。金雁顯然也意

識到這一點。因為1840年代的貴族知識份子是以歐化為取向的，主張漸進式改良，試圖創造俄國版的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如果能夠達成朝野合力的話，未始不能使俄國走向民主立憲的道路，漸次解決沙皇專制與農奴制問題。但是，貴族知識份子的失敗固然是因其缺乏深入俄國社會下層的動員能力，亦是因其一廂情願的政治主張在沙皇面前被不屑一顧。而隨着1860年代平民知識份子的出現，泛民粹化的鬥爭方式和「與汝偕亡」式的獻身精神造成了唯暴力取向，且賦予暴力以道義神聖性。如果說1840年代貴族知識份子更多地具有傳統東正教的悲憫精神而卻因自身的地位天然地具有遁世傾向，以至於空有理論而缺乏行動的話，那麼，從社會底層成長起來的1860年代平民知識份子則因其自身處境的卑微而天然地具有仇恨與叛逆心理，因更加深切地感受到社會不公而產生更大地推翻現存制度的衝動，從而也更加鄙薄理論上的突破，更加果決地採取行動，在這層意義上，他們恰恰是最徹底的尋神派。別爾嘉耶夫曾言：二十世紀俄國和德國發生的悲劇之格外強烈，是因為救世精神貶值為道德虛無主義，也是因為過度的沉默深深淹沒了一切性靈之光<sup>③</sup>。

#### 四 由民粹走向革命

從思想史的角度講，俄國知識份子從民粹主義走向虛無主義再接受馬克思主義，恰恰是與東正教一元論結構相一致的邏輯思維發展的必然結果<sup>④</sup>。1840年代的赫爾岑(Aleksandr Herzen)等貴族知識份子因反對沙皇而傾向民眾，1860年代的車爾尼雪夫斯基(Gavrilovich N. Chernyshevsky)等平民知識份子則訴諸行動而反對專制，相信民粹主義，並開始走向虛無主義。虛無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是甚麼關係呢？如俄國哲學家弗蘭克(Semen L. Frank)所說<sup>⑤</sup>：

虛無主義的道德主義是俄國知識份子精神面貌的最基本最深刻的特點：從對客觀價值的否定生發出對他人（「人民」）主觀利益的神聖化……因此人應當做的只是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獻給大多數人的命運之改善，拒絕這一點的一切人與事都是惡，都應當無情地消滅——這就是俄國知識份子的一切行為和評價所遵循的古怪的推理鏈條，它在邏輯上缺乏根據，在心理上卻是緊緊銜接的。

他繼續論證到<sup>⑥</sup>：

對此最適當的表徵是民粹主義。「民粹主義」概念將上述精神氣質的三個基本特徵聯為一體，即虛無主義的功利主義……俄國知識份子就其倫理本質而言，從大約七十年代至今都是頑固不化的民粹主義者……他們的唯一目的是多數人的幸福，他們的道德是為這一目的服務，伴之以禁欲主義的自制和對自我價值的精神需要的憎惡和鄙視。

俄國知識份子從民粹主義走向虛無主義再接受馬克思主義，是與東正教一元論結構相一致的邏輯思維發展的必然結果。1840年代的赫爾岑等貴族知識份子因反對沙皇而傾向民眾，1860年代的車爾尼雪夫斯基等平民知識份子則訴諸行動而反對專制，相信民粹主義，並開始走向虛無主義。

虛無主義付諸行動，便成為民粹主義。無神論與篤信宗教的親緣關係就在於一種極端主義的世界觀。平民知識份子尤其是神職人員大量出現於1860年代及其以後，使得唯物主義、無神論與民粹主義糾結在一起，徹底改變了俄國的文化類型，從此，為了達至最終的救贖目的，革命只問結果，不問手段。

1860年代的俄國知識份子意味着甚麼呢？——「非貴族出身的知識份子的出現，這是俄羅斯社會潮流史上十分重要的現象。在俄國產生了知識份子的無產階級，它將是革命風潮的酵素。來自精神階層的知識份子將起很大的作用。」<sup>⑧</sup>神職人員變成了革命者。比較溫和的1840年代的「理想主義者」被比較激進的1860年代的「現實主義者」所代替；同樣，後來比較溫和的民粹主義者被比較激進的馬克思主義者所代替，比較溫和的孟什維克被比較激進的布爾什維克所代替。雖然在此之後的革命愈來愈激烈，愈來愈極端，思潮內涵也有差別，但就歷史邏輯而言，1917年實則為1860年代的延伸。因此，破解「紅輪」之謎的關鍵就是解釋1860年代知識份子的形成。

不同於1840年代的貴族知識份子，1860年代的平民知識份子成為了革命的鼓動者，或許正是得益於他們自身所具備的一系列條件：一是民粹主義（雖然對於「民粹主義」並沒有確切的定義），或者說是人民性，同情普羅大眾，同情底層的民眾；二是對社會的強烈的批判意識；三是人道關懷，知識份子到民間去，和工農民眾結合在一起。尤其是第三點，是貴族知識份子無法做到的——受難成就了德性。典型者如車爾尼雪夫斯基。車氏的批判現實主義、民粹主義思想和烏托邦思想，是與布爾什維克主義一脈相承的。其長篇小說《怎麼辦？》成為俄羅斯虛無主義的基本教義、俄羅斯革命知識份子的必讀書。甚至它「對於最終導致俄國（十月）革命的進程所提供的激情動力，遠遠超過了馬克思的《資本論》」<sup>⑨</sup>。

1860年代的知識份子開啟了俄羅斯民粹主義佔優勢的時代。知識份子為了盡自己的義務，贖自己的罪而走向人民，深入到人民中去。或許單純從思想史的角度無法理解俄國知識份子的代際變化，尤其是民粹主義的擴散。事實上，沙皇專制統治的加強，促使民粹主義運動具有了革命性質。我們知道，俄國人民尤其是農奴「是國家的納稅人」，「我們的自由在沙皇那裏，只是被貴族藏起來了。」沙皇是農奴的「慈父」，是窮人的沙皇，這一觀念是「專制主義中的人民性」<sup>⑩</sup>，根深蒂固。人民尤其是農奴不買知識份子的賬，故而知識份子不僅受政府方面的迫害，而且人民本身也沒有接受他們。知識份子對農奴的革命性感到失望，農奴對沙皇專制制度的宗教神聖性的古老信仰還是強有力的，他們對地主和官僚的仇恨更甚於對沙皇的仇恨。從這個意義上說，知識份子在「農民中的失望導致了俄國馬克思主義的產生」<sup>⑪</sup>。

沿着這一思路，我們要問，1860年代俄國平民知識份子選擇革命的後果是甚麼？這比批判與追問1917年後的共產極權更為重要，因為前者是後者的遠因。欲破解「紅輪」之謎進而倒轉「紅輪」，重點不在於分析1917年之後的布爾什維克，而是1860年代發生的事情。

俄國民粹派在「到民間去」失敗後，走向訴諸個人犧牲和恐怖暗殺手段。民粹主義與激進主義合流之後，俄羅斯虛無主義與共產主義便成為同一個主題。

我們要問，1860年代俄國平民知識份子選擇革命的後果是甚麼？這比批判與追問1917年後的共產極權更為重要，因為前者是後者的遠因。欲破解「紅輪」之謎進而倒轉「紅輪」，重點不在於分析1917年之後的布爾什維克，而是1860年代發生的事情。

為了最終的救贖目的的達成，任何手段都是可以允許的。激進的俄國知識份子為實現自己高尚的目的而提供成本，付出代價的卻是整個社會，是所有公民的生命、財產、舒適或者聲譽，甚至是整個民族的生命與命運。涅恰耶夫 (Sergei Nechaev) 在《革命教義問答》中是這樣表述這種理念的：「革命者只有一個念頭、一個目標：無情地摧毀。他要冷酷地、時刻不懈地奔向這一目標。他必須時刻準備犧牲自己，用自己的雙手消滅妨礙實現這一目標的一切。」<sup>①</sup>這種極端禁欲主義的道德教條在實踐中幾乎必然會轉換成極端功利的道德虛無主義。如別爾嘉耶夫所言，「涅恰耶夫的革命策略允許使用最不道德的手段，這種策略大部分俄國民粹派的革命者都拒絕採用，這種策略甚至使巴枯寧害怕。」<sup>②</sup>

另一方面，1860年代知識份子及其後繼者所呼喚、製造與擁抱的革命之初衷與1917年之間為甚麼會有如此之大的反差甚至完全不同呢？俄國民粹主義的特點之一就是對國家持否定態度，它具有無政府主義傾向。而道德虛無主義之於激進革命而言，激進主義在否定現存制度的過程中是以全盤否定的破壞來達成目標的，目標與手段之間所存在的不一致性，基於歷史慣性，以手段代替目標，從而，激進的破壞無法建立起以自由、民主、憲政為基調的制度，而只能以比現存不公正制度更惡的制度來取代。反抗沙皇專制，追求自由人的聯合的共產主義革命卻催生出一個橫空出世的極權政體，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反諷。

平民知識份子的民粹主義宣傳對於底層並沒有太大的影響，他們正是由於在農村碰壁才轉而進行更加激進與極端的革命行為的。農民認同並走向革命的原因，很可能是沙皇當局的不公正所導致的形象之自我破滅，而非受到知識份子的鼓動。

## 五 知識份子的子彈：改革與革命天秤上的砝碼

正如前面所說，單純從思想史角度考察，是無法理解俄國知識份子的代際變化的，同樣，要分析俄國革命尤其是1917年革命的發生原因，固然有1860年代知識份子開啟的激進革命、只問目的不問手段的虛無主義之因素，但思想史上的流變與變遷並不足以使得革命必然發生，我們要問，是甚麼原因或因素導致知識份子必須以革命手段解決問題呢？在當時有沒有革命之外的途徑存在或嘗試？如果有，為甚麼沒有成功？事實上，對於這一系列問題的回答，才更具有警示意義。

我們知道，在1860年代知識份子登上歷史舞台之時，與俄國廢除農奴制大致處在同一時期。1861年亞歷山大二世 (Alexander II) 批准廢除農奴制度的法令和宣言<sup>③</sup>。一方面，沙皇在農民心目中的「慈父」形象更加上升，平民知識份子的民粹主義宣傳對於底層並沒有太大的影響，農民對於他們的熱情報以冷淡甚至仇視，很多知識份子還是在農民的檢舉下而被捕的。民粹主義者正是由於在農村碰壁才轉而進行更加激進與極端的革命行為的。農民認同並走向革命的原因，很可能是沙皇當局的不公正所導致的形象之自我破滅，而非受到知識份子的鼓動。另一方面，我們也會看到，俄國知識份子在這時湧現出了不同於民粹主義者的「工蜂」——一種致力於矯正社會發展病態與彌合社會差異，從而使俄國走上良性改革軌道的「第三種人」。他們是俄國歷史上的「第三種知識份子」，自我定位為「工蜂」，即勤勞工作，「幹實事」和「幹小事」相結合；以建立公民社會為己

任，為社會和政府構建一個橋樑，在當時的政治舞台上搭建一個良性互動的平台，是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俄國地方自治與立憲運動的中堅<sup>④</sup>。他們不與政府作鬥爭，不與不同的政黨展開廝殺，不利用國家的不幸達到自己的目的，而是促使社會各階層之間協調一致。工蜂知識份子不是從自上而下的改革或自下而上的革命出發，而是主張建設社會，發展與培育民間力量，啟動地方自治，進而力求使俄國走上憲政民主的道路，並且，在近半個世紀的實踐中，他們確實為民間培植了自治與專業的力量。而工蜂知識份子爭取民主的「迂迴鬥爭」與民間自治、地方自治的政治訴求最終被沙皇當局拒絕，無異於將俄國命運的天秤推向了革命的一端。兩者的合力，使得俄國工蜂知識份子的努力付諸東流，回天無術了。

俄國在1861年廢除農奴制的同時，引發了整個社會的全方位變動，它客觀上使西方各種思想進一步傳入俄國，使愈來愈多的俄國人看到了與西方的差距，紛紛要求改革。從歷史維度考察，1861年的改革並沒有徹底解決俄國的社會問題，尤其是農奴問題。因為農奴的「解放」並非意味着完全的自由，農奴在法律上有人身自由，地主不能買賣農奴和干涉農奴的生活；然而在財產權利方面，規定土地仍然歸屬地主所有，農奴可以得到一定數量的分地，但必須出錢向地主贖買；農民仍舊歸村社管理。因此，較之於「比較」意義上社會發展的需求，第二次農奴制改革勢在必行。這就是總理大臣斯托雷平 (Peter Stolypin) 的改革。

索爾仁尼琴的《紅輪》首先標明所敘的是「1914年8月10日至21日」之間的事。1911年遇刺身亡的斯托雷平是書中最重要的角色。索翁之所以如此安排，或許正是因為這確實是二十世紀俄國史開篇的頭等大事，也對後來俄國歷史發展的走向帶來了極大的影響。斯托雷平看到，「農民解放了，但農村並沒有因此而繁榮，反而衰敗了。土地利用率低，農民對不能繼承的地塊耕作並不熱心……農村村社並不保護任何人的利益，但挫傷所有人的積極性。」於是他着手「消除引發農民憤怒的根源」<sup>⑤</sup>。他扶持起富農階級，使之成為擁護沙皇制度的穩定的農村支柱，卻成為革命遺囑的執行人。因為他在土地改革中「保住地主，扶植富農，犧牲貧弱，分化農村」<sup>⑥</sup>，建立了規模經營，村社制度隨之解體，而依附於村社所形成的農民身份權利喪失後並沒有得到新的社保體系保障，由此顛覆了沙皇的「慈父」形象，失地者最終以十月革命的方式做出回答。

按照《紅輪》的記述，刺客柏格羅夫 (Dmitri Bogrov) 向斯托雷平開了兩槍，其實，他要殺的並不是斯托雷平這人，而是要殺總理大臣這個職務：「在俄國，當權人物就是專制制度的化身，誰當權我就殺死他，接連不斷地殺，不讓任何人永居高位。到那時，他們就會讓步。也只有到那時，我們才能改變俄國。」<sup>⑦</sup>而索翁對這事卻評論說：「俄國失去了自己百年來或兩百年來最優秀的政府首腦。」<sup>⑧</sup>

斯托雷平的改革之所以催生了革命，或者說斯托雷平之所以造就了列寧，我們很難看出平民知識份子以及其後的民粹主義、激進主義革命者從中所起到如何大的作用。社會底層尤其是農民的革命意願並非是由布爾什維克鼓動起來的，而恰恰是沙皇政府對於權力的不妥協、對於民間抱有的恐懼與遏制心理，尤其是不公正的社會改革，使得沙皇統治的歷史合法性被淘空，農奴的「慈父」

斯托雷平的改革之所以催生了革命，我們很難看出平民知識份子以及其後的民粹主義、激進主義革命者從中所起到如何大的作用。恰恰是沙皇政府對於權力的不妥協、對於民間抱有的恐懼與遏制心理，尤其是不公正的社會改革，使得沙皇統治的歷史合法性被淘空。

成為農民的仇敵，民粹主義得以被廣為接受。雖然斯托雷平倡議的新的土地措施會使農村大為改觀，以至於農民再也不可能成為一種革命力量，但是卻造成了俄國人民的分裂。很大程度上，改革是與下一次社會大動蕩——即革命之間的一場時間競賽，如果大動蕩被推遲二十幾年，或許可以借績效而彌補社會裂痕，如沃爾夫 (Bertram D. Wolfe) 所言：「列寧在斯托雷平統治的末期曾幾次這樣說：我不指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革命了。」<sup>20</sup>然而革命畢竟被鼓動起來了——通過暗殺的子彈。誰來為這顆子彈負責呢？即便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但革命的手段是不應該否定或取代目的的。

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在分析「革命和政治秩序」這一主題時，曾將城市與農村兩分，前者代表知識份子，後者代表農民。他認為城市的作用是一個常數，它是反對派的力量根源，而農村的作用是一個變數，它如果不是穩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按照政治學上的保守與激進的劃分，大致可作如上觀。當然，亨氏不是專門針對俄國革命才作上述判斷的，他的觀察的立足點是法國<sup>21</sup>。然而，這一劃分對俄國來說卻異常合適。知識份子與農民的合流，更確切地說，保守的農民轉變成為激進的革命者，便意味着改革由革命的代替物轉變為革命的催化劑。從1860年代平民知識份子的虛無主義中，產生了1870年代革命的激進主義，在二十世紀初深入到了俄國社會的最底層。就因果關係說，暗殺的子彈引發了1918年7月16日葉卡捷琳堡 (Yekaterinburg) 地下室內的亂槍聲——沙皇尼古拉二世 (Nicholas II) 被處決。而沙皇當局政治上的封閉性與獨裁性，使得政治空間日益逼仄與壓抑，政治改革的迴旋餘地喪失殆盡，民間不滿情緒急劇擴散，起到了「激變良民」的效果。工蜂知識份子建設社會的主張無法實現，在民粹主義與底層的不滿急速聚合的情況下，瞬間轉向革命，終於使得沙皇成為眾矢之的，漸進改良被不公正的制度變革所阻斷，「紅輪」終於駛上軌道。

平民知識份子一手塑造與迎接了共產主義革命，但是，「虛無主義的理性主義」之底色決定了它是一種「需要專制主義」的革命，當激進革命的手段取代目的成為第一考慮，當它排斥了自由作為追求平等的代價之時，它就極有可能蛻化成特殊的專制形式，即展現於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革命成為異化。

平民知識份子一手塑造與迎接了共產主義革命，但「虛無主義的理性主義」之底色決定了它是一種「需要專制主義」的革命，當激進革命的手段取代目的成為第一考慮，當它排斥了自由作為追求平等的代價之時，它就極有可能蛻化成特殊的專制形式。

## 六 「告別革命」

就俄國革命的性質或影響而言，固然存在諸多爭議之處，但其本身便蘊含了被否定的最根本原因。1946年，流亡中的別爾嘉耶夫在巴黎寫道：俄國革命喚醒和解放了俄國人民的巨大力量，這就是它的主要意義，同時背叛了俄羅斯彌賽亞救世主義，並使專制、黑暗和奴役死灰復燃，這就是它的根本教訓<sup>22</sup>。今天之所以要對俄國知識份子的心路歷程加以關注，與其說是為了「倒轉紅輪」，不如說是探究「紅輪」何以馳向革命，知識份子在其間起到了甚麼樣的作用，到底是誰、是甚麼原因造就了革命。因而，破解不同年代知識份子的成長、主張

及競爭，以及最終的結局，便是它的世界意義所在，這也是當下中國知識份子探討歷史上俄國知識份子時所糾結於心的問題。

後世之人檢討這段經歷的時候，往往唏噓不已。當一個社會的思想基調愈來愈激烈，非激進無以達到目的，且激進被賦予道義合法性的時候，它便排除了其他任何理性建設的可能。無論作為文化的還是政治的激進主義，都不是憑空而來的，與其探討為何產生激進，不如探討如何改良激進主義賴以生存的土壤。在怵惕於暴力革命尤其是共產主義革命所造成的破壞與政治建設的失敗之際，尤其是基於中國自身的百年革命體驗，「告別革命」成為包括知識份子在內的社會共識。也正是有了這種後見之明，使得我們很難回答為甚麼革命會發生。在《倒轉「紅輪」》一書中，金雁通過梳理前因後果，往往給人一種歷史原來如此的感覺。尤其是，當明白了「紅輪」是被布爾什維克處心積慮策劃者駛上軌道的時候，我們在明瞭事件背後的原因的同時，往往會產生一種莫名而痛苦的沉思——「我們被騙了！」

索爾仁尼琴在分析二十世紀俄國的悲劇命運時問道：這個狼種——它在我們人民中是從哪裏來的呢？它是不是我們的根子上長出來的呢？是不是我們的血統？「這是一個可怕的問題，如果我們誠實地回答的話」，「是我們的」<sup>⑤</sup>。對此，中國知識份子宜有所思。

是的，這是知識份子自身的責任。然而，這又不僅僅是知識份子所面臨的問題。或許，選擇與迎接革命的主動權在知識份子手中，然而，製造或引發革命的肇事者是誰呢？只有理性建設社會，方能告別激進革命。否則，僅僅將「紅輪」倒轉，並不足以防止歷史重新馳向同一「紅輪」的軌道。

或許，選擇與迎接革命的主動權在知識份子手中，然而，製造或引發革命的肇事者是誰呢？只有理性建設社會，方能告別激進革命。否則，僅僅將「紅輪」倒轉，並不足以防止歷史重新馳向同一「紅輪」的軌道。

### 註釋

① 艾森斯塔德(Shmuel N. Eisenstadt)著，劉聖中譯：《大革命與現代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頁12。

② 金雁：《倒轉「紅輪」：俄國知識份子的心路回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③ 王康：〈俄羅斯知識份子給人類的啟示〉，《南方都市報》，2012年9月13日。

④⑦⑩⑭ 參見金雁：《倒轉「紅輪」》，頁4、3；15-16、17、26；512；597-614。

⑤ 「路標派」因1909年出版《路標文集》而得名。該文集作者包括別爾嘉耶夫(Nikolai A. Berdyaev)、布爾加科夫(Sergei N. Bulgakov)、弗蘭克(Semen L. Frank)等七人。路標派在政治上傾向於立憲，致力於對文化激進主義和道德虛無主義的反思，試圖將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結合在一起，最終逐漸從現實關懷轉移到宗教哲學裏。大多數成員在1922年的「哲學船事件」中被蘇俄政府驅逐出境。

⑥ 十九世紀中前葉，俄羅斯的思想界和文化界逐漸分成兩大派，一派是「斯拉夫派」，一派是「西歐派」。前者認為，俄國文化異於並優於西方，俄國的土地、村舍和東正教真正體現了基督教的兄弟之情淳樸美德。後者則恰恰相反，認為俄國本土文化是完全過時、落後和反動的，俄國必須向西方學習，才能夠擺脫沙皇專制和農奴制。兩派的爭論一直維持了二十餘年，後來才演變出民意黨人、社會民主派和布爾什維克。

⑦ 「向後看的反專制運動」是普列漢諾夫對俄國歷史上的宗教分裂運動的評價。「俄國的宗教運動雖不完善、也不正確、比較狹隘，但卻是一種特殊的人民自我教育機制。」

參見普列漢諾夫(Georgi V. Plekhanov)著，孫靜工譯：《俄國社會思想史》，第二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頁355。《倒轉「紅輪」》的思想定位為何以「向後看的反專制運動」為起點，則在以索爾仁尼琴為個案的研究中有詳細交代，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它是此後一系列思想裂變的源頭。參見金雁：《倒轉「紅輪」》，第一章。

⑨ 參見金雁：〈自序〉，載《倒轉「紅輪」》，頁15。

⑩⑪⑫ 別爾嘉耶夫(Nikolai A. Berdyaev)著，雷永生、邱守娟譯：《俄羅斯思想：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俄羅斯思想的主要問題》(北京：三聯書店，1995)，頁27；106；118；118-19。

⑬ 別氏認為，「俄羅斯的知識份子是完全特殊的、只存在於俄羅斯的精神和社會之中的構成物。知識份子不是一個社會階級，它的存在給馬克思主義的解釋製造了困難。」參見別爾嘉耶夫：《俄羅斯思想》，頁25。

⑭ 自此點觀察而言，俄羅斯的知識份子確實是不同於西歐或東方的，在他們身上，道義性大於知識性，「俄羅斯的哲學思想中將是宗教的、道德的和社會的因素佔優勢。」別爾嘉耶夫對於「知識份子」的定義，傾向於貴族精英，宗教人道主義意味極為明顯。但從實踐角度而言，別氏的論斷缺乏社會學意義上的支持。相較而言，伯林(Isaiah Berlin)後來對於俄國知識份子的考察更具有社會學意義。伯林在《俄國思想家》(*Russian Thinkers*)中，考證了「知識份子」(intellectuals)一詞的詞源，正式產生於1870年代，具有很濃烈的道德訴求。1860年代以後，無政府主義、民粹主義、馬克思主義等各種流派相繼湧入俄羅斯，「知識份子」這個定義，也就成了政治競賽的詞語工具，愈革命愈「知識份子」。「知識份子」逐漸與「職業革命家」劃等號。帝俄時代，無政府主義的主要成員，是貴族革命家；民粹派的主力，是平民知識份子；而馬克思主義者，則是新一代平民知識份子。參見別爾嘉耶夫：《俄羅斯思想》，頁107；伯林(Isaiah Berlin)著，彭淮棟譯：《俄國思想家》(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頁144、161、258-65、275-82。

⑮ 引自大遲：〈面對永恆矛盾的俄羅斯詩人〉，《書屋》，2001年第3期，頁21。

⑯ 「實際上，俄羅斯虛無主義的主題和俄國共產主義的主題是同一個主題，指出下面這點是非常重要的，即俄羅斯思維是傾向極權主義學說和極權主義世界觀的，只有這類學說在我們這裏能夠有所成就。」參見別爾嘉耶夫：《俄羅斯思想》，頁29。

⑰⑱ 弗蘭克(Semen L. Frank)著，徐鳳林譯：《俄國知識人與精神偶像》(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頁54；56-57。

⑲⑳ 金雁：〈二十世紀初俄國的改革、戰爭與革命〉，《書屋》，2009年第1期，頁4；6。

㉑ 參見金雁：《倒轉「紅輪」》，頁586。涅恰耶夫是現代政治恐怖主義之「鼻祖」，視民意黨和社會革命黨的恐怖活動和組織形式為現代國際恐怖主義的一個源頭。他首開俄國近代革命運動中的政治恐怖主義之先河，是無政府主義和政治恐怖主義的怪胎。其所著的《革命教義問答》用詞過於激烈和直白，因此無論是當時的革命者，還是後來的蘇聯政府都是秘而不宣，被國際學界稱為「恐怖主義聖經」。

㉒ 安德森(Perry Anderson)著，劉北城、龔曉莊譯：《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頁368。

㉓⑳ 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I. Solzhenitsyn)著，何茂正等譯：《紅輪》，第一卷(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0)，頁645、648；604-605；787。

㉔ 引自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著，王冠華等譯：《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頁312。

㉕ 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第五章。

㉖ 引自王康：〈十月革命90年：救贖、悲劇與啟示〉，《南方週末》，2007年11月7日。

㉗ 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I. Solzhenitsyn)著，田大畏、陳漢章譯：《古拉格群島》，上卷(北京：群眾出版社，1999)，頁156。